

大麥地岩畫

Da Mai Di Rock Arts

③

大孝地畧

何炳子署



西北第二民族學院 編纂

主 編 謝玉傑

副主編 李祥石

束錫紅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9.上海

岩畫與中國的悠久文明

E·阿納蒂

意大利史前藝術研究中心執行主席

中國的杰出藝術在歐洲備受贊譽。博物館收藏、鑒賞其歷代藝術品，所有的專業藝術史書籍裏對它們有着很高評價。但中國的岩畫卻少有人知曉。

岩畫即在岩石表面鑿刻或繪制而成的圖畫，是新石器時代以來部族社會及王朝時代各部落與少數民族歷史的見證，是無文字的人們記錄和溝通信息的表達工具。岩畫是了解中國早期文明與歷代民間藝術與信仰各方面的重要材料。然而作為中國文化遺產一部分的岩畫在歐洲却少有人知。

CCSP——史前藝術研究中心——是意大利致力於史前與部族藝術研究的機構。從1991年起CCSP組織過一些考察旅行，研究中國藝術與文明的起源問題。主要目標在於增進對中國歷史的更好理解以及促成中國與歐洲考古學家的對話。意大利的同事們對考察的經歷充滿熱誠。一些中國岩畫方面的主要專家在中心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培訓與研究，並成為我的學生。在中心與陳兆復教授、湯惠生博士及其他學者的討論給我留下溫暖、友好的印象。

考察旅行也給我們與中國大學教授、藝術家、管理人及其他文化界人士接觸的機會，並使我們獲得直接的知識，這些知識我們已向學生和讀者傳遞。友好的溝通帶來積極的合作並使歐洲更好地了解中國岩畫遺產的狀況。

我們的興趣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但我們也訪問了其它一些地區。我們考察了中國北方幾省，主要是新疆、甘肅和青海。廣西省左江流域和其它幾個岩畫主要分布區令我們贊嘆不已，然而我們將興趣集中於寧夏回族自治區，尤其是以豐富的岩畫遺產及其它考古遺迹聞名的賀蘭山一帶。多年來我們的主要向導都是來自銀川的安亞平，他既是一位優秀的組織者又是一個好朋友，也是我們考察的接待者。李祥石與其他幾位朋友，以及來自寧夏的同行們陪同我們參觀了著名的大麥地，美麗的景緻裏，我們見到很多描繪獵人、游牧群落的岩畫作品。

我們還參觀了一些考古遺址。黃河流經那些有着最集中和最發達農業經濟的省份，包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這些地方的史前村落從公元前7000年就開始發展，並有早期的灌溉系統。

通過對位於西安附近的新石器時代村落半坡遺址的研究，我們了解了灌溉渠道何以使農業用地擴張，同時控制水資源——對於農業人口來說的主要財富——的分布。這種對水資源的早期控制可能使組織灌溉的階層得到發展，他們徵收稅款，這也成為君主、王朝產生的基礎。從那時起，農田的分配、灌溉的布局與協調成為幾千年來政治力量和財富的主要來源。

在其它少數民族與漢族混居區域，黃河河道為山穀和沙丘環繞，變得越來越窄，因此對農耕土地的廣泛利用也發展緩慢。在不少地區，農業用地集中在易于灌溉的地方，例如黃河流域。一旦出了黃河流域，自然景物就變成淺薄的干草原和沙漠，或者石山，在這種石頭山上，放牧取代了農業耕作。在內蒙古和青海這種現象非常突出。在黃河的寧夏段與甘肅段可以看到這兩種景觀的交替，較落后的省份裏農業地區也更為有限。在寧夏與甘肅兩省，長城隨黃河走勢綿延數百裏，意味着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這是定居人口與游牧民族之間的邊界線。

賀蘭山集中了超過350塊岩畫，構成了“石頭上的檔案”，記錄下數千年的歷史場景，代表了至少三類不同人群：1）早期農民，至少公元前7000年開始在此地區發展，也可能在前8000年已經發展了；2）主要來自蒙古的牧民，從公元前5000年到近代在此地駐留過幾次，前後延續了六千多年；3）狩獵采集人群，他們制作岩刻，大約一萬年之久。賀蘭山岩畫出現在其他兩種岩畫之前，與其它兩種共同延續。幾千年來，不同的社會形態與狩獵群體、農業村落以及半游牧的畜牧人口在同一區域內共存。

繪制的岩畫在寧夏非常少見，通常是“岩刻”，代表

了不同的風格和生活方式。與亞洲其它地區的同期岩畫相一致的是，它們也是不同社會經濟背景下的不同人群在岩石上所作的記錄。最早的是狩獵群體，然後是存在于不同時期的牧民。但大多數岩畫是混合了各種經濟形態，包括農業、畜牧業及狩獵的社會的產物。

賀蘭山的岩畫集中于山谷，而大麥地是一個多山的地帶。與賀蘭山相似，大麥地地區直到近代也保留着寺廟與朝拜。這種傳統好像回到了史前時代。

在大麥地，幾百件鑿刻過的岩石組成了一座精彩紛呈的露天博物館。藝術愛好者在這裏能獲得極大滿足。大部分作品描繪了狩獵與畜牧活動，農業社會場景則罕有表現。這片地區好像是狩獵、動物養殖以及部族采集活動的場所。

賀蘭山最重要最集中的岩畫是肖像和神佛面具像。賀蘭山有最豐富的人面像岩畫。大麥地也有一些表現相似人面像的作品。這種圖案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延續了很長時間。賀蘭山許多這種人面像伴隨着對武器和工具的描繪出現，主要有斧，可能與早期王朝夏、商、周有關。從這些人面像來看，似乎在約兩千年內，賀蘭山一帶都是一個有着對祖先、靈魂及其它自然物崇拜信仰的地區。大麥地也有少數人面像反映了相同的信仰觀念，但狩獵儀式似乎是主要題材。

2 相當于周朝時代，岩畫的新風格產生了。顯著標誌是軀體繪有圖案裝飾的程式化的動物形象。一些可能是圖騰崇拜的動物，如虎、鹿。這種風格普遍見于亞洲許多地區，與斯基泰人有關。發源于中亞的斯基泰人既是牧人又是獵人，還是著名的騎師。他們的足跡東至中國，西至歐洲，並在寧夏一帶存在了很長時間，後幾個階段他們以某些方式與蒙古人聯結。這種新風格在大麥地也有所表現。

寧夏岩畫的后期作品描繪的是商旅，一些動物形象可能是駱駝。它們已經比較接近近代，只有數百年的歷史，涉及貿易活動的伊斯蘭藝術與絲綢之路不無關聯。

岩畫遺址是文化教育的重要資源，也應將成為教育與文化旅遊的資源之一。

寧夏的岩畫涵蓋了關於不同經濟社會組織形態的獨特記錄：狩獵社會、畜牧業社會以及農業人口的定居村落。獵人與牧人生活在山地，農業人口生活在黃河流域沿河兩側。岩畫便主要集中在這兩種地貌的交界處，人們會在這些地方交匯，舉行特殊的宴飲及宗教活動。

不同人群之間的交流與衝突似乎是早期中國許多歷史事件的根源。早期農民遭遇狩獵采集者，定居人口與游牧牧民的衝突標志着中國歷史上北方邊境的衝突事件。

不同族群與農業人口的碰撞似乎從史前時代開始就是這一區域文化中的常見模式。

黃河流域有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明遺迹。這些早期農民的遺存物暗示了遠東與中東的一些聯系，陶器的紋飾體現出美索不達米亞與印度河流域風格的相似。似乎在絲綢貿易以前，沿着“絲綢之路”進行的貿易活動已經有所發展。“絲綢之路”這個浪漫的名字可能是一個近近的發明，但交流與溝通却沿着這條路不斷增進。歷史上早期它也是其它貴重商品貿易的主要通道，如玉器、象牙，甚至鴉片。它同樣也是部族遷移的通道。

寧夏岩畫的不同風格也體現出人類活動範圍之廣。后期狩獵社會的岩畫似乎與新石器時代農民所作的同期，這與希伯來和中亞岩畫有重要的共通之處。同樣在中亞，岩畫比較集中于山地以及其它農業不太發達的地區。大麥地的畜牧岩畫在風格與主題方面與新疆、蒙古的同類岩畫相同。可能是牧人易于從一個牧場遷移到另一個。

中國北方，特別是黃河流域，不僅是農業的沃土，也是考古學與歷史學研究的寶地。可預見的是一項有前途的研究仍將進行。近年來中國的考古學家集中于發掘、發現、記錄與研究，這些工作為我們研究早期中國人幾千年來經濟、生活方式、社會政治結構以及社會生活的發展脈絡提供了廣闊視野。

一個相關方面是研究從上舊石器時代進入使用細石器的中石器時代，再到農業定居的早期農民，以及使用陶器的新石器時代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轉變而來的農業的起源問題。

前王朝時代文化的定居點數量和規模或許能提供一些有關中國人口爆炸的基本想法，至少從七千年前已經開始，至今仍在發展。最有趣的主题之一是有關中國與亞洲其它地區早期文化、商務交流的研究。岩畫可能是這種比較研究中的有用的原始材料。

遺骸、異域物品以及在中國北方不同省份發現的物質文化與身體裝飾的其它元素，顯示人們往來進出中國的痕迹。這些活動從新石器時代農業起源時就開始增加。從最一開始，中國文明的主要內核就與其它民族有着往來交流，既有傳授又有吸收。對史前及中國文化起源的研究同樣為研究不少少數民族起源提供了啓迪。這些少數民族現在仍保持着異于漢族的習俗。移民、貿易與文化聯系為創造不同民族間積極的共存、合作作出了貢獻。

我們對中國的考察之行有了一個令人滿意的科研成果，同樣也提供了中國與西方同行交換認識與觀點的機會，這在今天的世界都是非常積極有益的。

序 言

盖山林

水流雲在，永垂千秋的造型藝術岩畫，是人類文化藝術史上一種奇特的文化現象。在沒有文字之前，人類曾長期依靠在岩石上刻畫圖象和符號，記錄事件，表情達意，描繪人類的歷史與精華，它起着文字的作用。岩畫生發的自然美、稚拙美、殘缺美，激蕩着目睹者的心扉，使人斷魂落魄，如痴如醉。岩畫作為歷史文化的載體，如同歷史的卷帙，閃耀着先民們的靈光，凝結着中華先祖的智慧，成為人們了解歷史、文化、藝術最珍貴的形象資料，是人類用四萬年沉積下的一份最厚重的文化財富。

寧夏中衛市大麥地岩畫，深居于中衛市東北部，往南不遠，經過一片平疇沃野，便是浪濤滾滾的黃河。這裏不但在自然界，而且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占有光輝的一頁，先後獵牧于我國北方地區的少數民族，諸如鬼方、華粥、匈奴、鮮卑、土穀渾、回紇、黨項、蒙古等，莫不以這裏及周圍地區為員苑囿，創造了當時世界上堪稱先進的獵牧文化。然而這些民族一個個飛掠而去，有的甚至連影子也沒有留下，只是在荒烟蔓草中留下了他們的來踪和去迹，比如他們居住過的遺址、遺物，以及他們長眠的墓地。在各個民族、部落之中，遺留下最豐厚的遺迹，是他們在曠野裏在千萬年的時間裏制作的岩畫。

從1976年至今，我一直是岩畫的痴迷者，在近30年的時間裏，我先后考察過內蒙古岩畫，以及廣西、雲南、西藏、江蘇、福建、山西、黑龍江、遼寧、新疆、青海、甘肅等省區岩畫，一直從事岩畫的考察和研究工作。對寧夏回族自治區，我先后四次考察過賀蘭山、北山岩畫，作為北山岩畫組成部分的大麥地岩畫，我在寧夏同行的協助下考察過三次。經過考察和研究，使我深深地感悟到，大麥地岩畫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而是寧夏南部和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南部岩畫帶的組成部分。這個岩畫帶地域遼闊，包括的地域有寧夏中衛市的北山地區的

大麥地、黃石坡、石房圈、新井溝、大通溝、苦井溝；香山地區的石馬溝、石羊溝、大井溝、驢胡槽子、南井溝、紅石水溝、茶樹溝、韓鎖井等地岩畫，青銅峽市的口子門溝、四眼井岩畫，中寧縣的石馬溝、黃羊溝岩畫，以及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南部的畢其格圖山、敖尤圖山、阿孜日格爾山、稀勒圖山、雙鶴山、鷹爪灣等地的岩畫。這些地方的岩畫，在題材、內容、風格、時代、作者等諸方面，存在着極大的雷同性，可視作同一種岩畫類型，是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中世紀以來獵牧民族的岩畫作品。

對中衛市大麥地等地岩畫的考察和研究，始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直延續至今。寧夏的考古學家在考察和研究基礎上，已有大批成果先後問世，主要著作有《中衛岩畫》、《賀蘭山與北山岩畫》、《賀蘭山岩畫》等。以上著作，對大麥地岩畫都有或多或少的記錄和研究。

然而研究工作是繼承性的，科學的發展往往是接力賽的結果，科研成果多是前人工作的發展和繼續。

令人欣慰的是，岩畫研究的接力棒在不知不覺中傳到了西北第二民族學院，他們成立了我國高等院校第二個岩畫研究中心，人才濟濟，老中青結合，又干勁十足，僅僅用了二年的時間就把大麥地岩畫認真的調查了一遍，梳理了一遍，其中的甘苦我是有體會的。他們沒有白辛苦，沒有白跑路，終於在荒涼的山地上趟出了一條路，完成了四大本皇皇巨著。真是可賀可喜。

我們這個泱泱大國，世界文明的古國，有關岩畫的著作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因此，對於著書立說，藏之南山，傳于後人，澤被當代的偉業我從來都是極力推崇的，我也預祝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岩畫研究中心在今後不斷取得更大的成績。

大麥地，大麥地，多么美好的名字！我曾多次踏上過這個神奇的土地，我也一直在盼望着有一套《大麥地岩畫》專著問世，這個願望由西北二民院的岩畫同仁們

完成了，我再次表示誠摯的謝意，對二民院領導的遠見卓識表示欽佩。

在《大麥地岩畫》專著出版之際，西北二民院岩畫研究中心李祥石先生囑我寫序，使我憶起才氣橫溢的杜牧為李賀詩集作序時費思量的情景：“復就謝，極道所不敢賀序”。拿筆在手不知從何說起。然而囑之殷殷，詞堅意篤，加之大麥地岩畫的魅力和誘惑力，因此寫了上面

的那些話，權為序。

2005年2月8日

（蓋山林，全國政協委員、內蒙古政協副主席、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大麥地岩畫中發現我國最古老圖畫文字

李祥石 束錫紅

寧衛北山橫亘於寧夏回族自治區西北部，是寧夏與內蒙古自治區的界山，也是寧衛平原的天然屏障，由泥盆紀（Devonian 3550—4100 萬年前）和石炭紀（Carboniferous 2950—3550 萬年前）碎屑岩組成。

寧衛北山是一條東西走向的低緩山地，東西長 50 公里，南北寬 25—30 公里，海拔 1300—1600 米，相對高度 200—300 米；山勢平緩，植被稀疏，基岩裸露，為古代遊牧先民製作岩畫創造了優越的天然條件。

寧夏寧衛北山，據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岩畫研究中心 2003 年 10 月最新統計有 3172 組約 8000 個岩畫個體圖形。這些鐫刻在山石之上的岩畫，是先民們狩獵畜牧文化的真實寫照，從多方面反映了他們火熱的生活、美好的願望和熱烈的情感。這些藝術的珍品是歷史凝聚積澱下來的“藝術化石”，為我們提供大量直觀的圖像資料和文化符號，分佈集中，數量龐大，可稱作碩大無比的藝術文化遺產，是民族文化的瑰寶。我們把岩畫稱為“石頭的书寫”。

大麥地岩畫，地處寧夏寧衛北山的腹地，如今是寧夏地區一處重要的人文景觀和文化寶庫。

大麥地從小環境看相對封閉，四周高山環列，恰似在盆地之中。從大環境分析則是處在一個古代文化交流的通道上，地處賀蘭山的南部，離衛寧平原 20 公里，離黃河也僅 30 公里。

岩畫是原始先民生活和文化的反映，是人類早期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的產物。大麥地岩畫內涵豐富、題材多樣、造型生動、意境深邃，包括日月星辰、天神地靈、男根女陰、手足蹄印以及狩獵、放牧、舞蹈、祭祀等活動場面。

岩畫的主題多為寫實，生動傳神，有很高的藝術性，有古樸怪誕離奇斑斕的神話故事。更為神奇和稱道的是，岩畫又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符號系統，用藝術化的抽象符號表達了一種變換無窮、深奧莫測的內心世界。

在大麥地岩畫數百個岩畫的符號中，我們發現了似文似圖的符號，並有由單個符號組成的複合型帶有詞語性質的圖符，我們暫稱其岩畫語言。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發現，岩畫研究無疑對象形文字的起源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大麥地這種類似文字性質的符號，有一個重要特徵：即早期岩畫的象形性，與漢字中的象形字形體相類，由此推斷它是原始文字。

文字的發明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人類的社會生活需要信息的交流和傳遞，在漫長幾十萬年的舊石器時代，人們在獵取野獸與采集果實過程中，都要依靠準確的信息交流而達到協同的合作，從此，人類發明了語言，靠語言互相聯

絡協調活動，完成狩獵與采集等行動。

然而語言要受到時間的限制，它說過之後就消失了。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文字可以把人類的語言、思想等等記錄下來。

關於岩畫與刻劃符號是不是文字或文字前身的書寫形式，在 20 世紀就已經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但在世界性的岩畫研究中，時至今日也只是找到零星的似符號又似文字的形象與圖案，從沒有找到過如大麥地發現的這種如文字符號組成的複合式符號。漢字既然是漢民族語言的書寫符號，而中國漢民族又是一個多民族的組合體，那麼它的來源就是與漢民族先民相關的諸民族前身的語言和文化有聯繫。具體說就是與漢民族的先民諸華夏族有關，與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有關甚至更早、更早。

大麥地原始先民用當地產的硬度較大的原生鐵礦石塊，在自然平整的岩面上敲、鑿、刻、磨製作岩畫，並一代又一代地延續着繼承着。

關於賀蘭山與寧衛北山岩畫的斷代，至今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課題。一般沿用考古學中的對比方法判斷相對年代，譬如從岩畫中尋找已經絕滅動物，利用岩畫的風格和岩畫的疊壓關係等多種方法來確定岩畫製作時間。

學術界現今多採用用麗石黃衣測年方法，這種方法是上個世紀 50 年代奧地利學者用地衣植物麗石黃衣的生長年限對冰川沉積物進行測年，後來運用於地震、地質、氣候、考古、岩畫等方面研究。用麗石黃衣測得賀蘭山與寧衛北山岩畫早期距今為 13000—10000 年，中期距今為 10000—4000 年，即早期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大麥地的先民們就已經掌握和學會了使用硬石塊製作岩畫和刻劃文字符號。

我們對大麥地岩畫調查時，在同一岩層面除了采集到大量的原生鐵礦石塊外，在岩畫點金水子臺地上還采集到了有繩紋、劃刻紋等紅陶片和灰陶片，證明早在新石器時代，我們的先民已經在大麥地繁衍生息，岩畫中保存的狩獵畜牧文化，其中相當一部分可稱作古老的文字符號。

為了做進一步的說明，經過綜合對比大致分類，大麥地表意符號岩畫有以下三種：

一、由圖畫抽象成象形、會意、指事符號，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演變成為遠古原始文字符號。

舉例如下：

圖 1：新井溝東頭道梁，編號 141 組，畫面寬 13 厘米，高 15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由三個圖畫符號組成，敘述氏族戰爭

爭奪土地、人口、牛羊，征服者戰勝了對方，取得了勝利。這是征服的記錄，也是勝利的記錄，更是臣服的記錄。

1. 右側是勝利方氏族首領踞接受降者的跪拜，此人顯得高大威武。

2. 左上側是一弓箭，表示武力，表示統治，也表示佔領。

3. 左下側一人在弓箭武力的震懾和壓迫下跪拜求饒，或請罪，或臣服。

此圖表達了一個完整的意思，是一個完整意義的文字符號。

圖2：大麥地三道梁，編號113組，畫面寬21厘米，高35厘米，鑿刻製作。此圖由兩個圖畫符號組成，表達的是狩獵後將羊進行祭祀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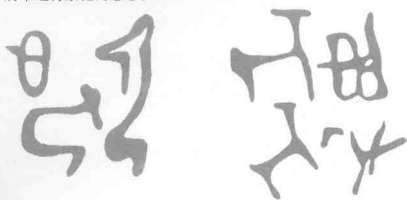


圖1

圖2

1. 上部一獵人用弓箭對準一隻北山羊，意為狩獵的意思。

2. 下部將獵到的這隻羊要放到火上烤，準備將羊祭祀。

圖3：新井溝東頭道梁，編號126組，畫面寬34厘米，高31厘米，鑿刻製作。此圖記錄了一次特殊的天象，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



圖3

1. 上部是一個螺旋形的特殊天體原型。

2. 人跪在地上向天體行大禮。表示了人們對一次特殊天象的恐懼。向天空行大禮者可能不是一般人物，而是通天行地的巫師。

圖4：大麥地八道梁，編號39組，畫面寬12厘米，高12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左為羊，右為蛇，各自代表了羊圖騰部落與蛇圖騰部落，在進行一次平等的協商，並且達成了協議。



圖4

從以上圖畫可知，岩畫作為原始藝術，它不僅表現了原始人的生活 and 感受，真實而客觀地反映了外部世界，而且用類似于原始符號文字的形式描繪和記錄了這些場景。

二、圖畫與符號文字混合表意更豐富。

這種具有具象圖畫又有抽象符號的描繪生活場景的岩畫，應該是岩畫圖案由圖畫到抽象符號文字的過渡時期。過去的文字研究中没有這種類似的雛形文字，然而在大麥地岩畫中確實存在這種圖畫與符號相輔相成又相得益彰的精彩篇章。這種圖畫、符號互相補充互相交織，符合文字發展的規律，文字的發展是先有圖畫，然後有了圖畫與符號配合，即由繁到略繁，最後達到實用、簡約的目的，不可能由繁一步達到簡化目的，其間必然有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過渡期就是圖畫與符號相混雜相融合相搭配。過去由於資料所限，人們在研究文字時忽略了這個階段，現在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

這種符號文字的最大特點就是除圖畫形象外用符號表示會意和指事，功能更加具有了實用性。

舉例如下：

圖5：大麥地三道梁，編號33組，畫面寬11厘米，高14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右上部為一隻羊，左上部為一個人面，其中部為S形符號，下部為一橫符號，這是一組圖畫與符號組合的符號文字，描述了一個寧靜的田園生活場景。

圖6：大麥地三道梁，編號157組，畫面寬18厘米，高27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部如“同”字形符號，下部為流水圖畫，其意可能是向上天祈求雨水的記錄。



圖5



圖6

圖7：苦井溝，編號37組，畫面寬31厘米，高44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右上部為一勾形符號象徵微蛇，左上部為一隻羊，下部為一隻羊。此符號指山羊遇蛇驚嚇逃竄。

圖8：新井溝頭道梁，編號156組，畫面寬18厘米，高17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部為一動物符號，右下部為一人形執弓符號，左下部為一羊形圖畫，其含義可能是狩獵動物意思。



圖7



圖8

圖9：石房南二道梁，編號34組，畫面寬11厘米，高12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左側為叉形符號，右側為四隻燕子，表示燕歸來或飛去，是說明四季變化的符號文字。



圖9

圖10：西坡，編號97組，畫面寬32厘米，高22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部為動物和羊圖畫，僅左下部為S形符號。其意指動物遷徙路線或找水的方向。



圖10



圖11

圖11：新井溝西，編號7組，畫面寬19厘米，高31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部為動物圖畫，下部中為四個符號，最下部為一隻羊。其符號文字表示衆多動物活動場景。

圖12：老虎嘴溝一道梁，編號2組，畫面寬12厘米，高38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部為一隻羊，下部為日字形池塘符號，其符號文字指羊臨池飲水。



圖12



圖13

圖13：石房南二道梁，編號63組，畫面寬18厘米，高15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部為一隻鹿圖畫，下部為半月形符號。其意可能指明鹿的活動時間，或獵鹿的最佳時間。

圖14：新井溝黑山梁，編號72組，畫面寬17厘米，高17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部為彎勾符號，中間為羊角形符號，下部為一隻羊圖畫。其意似羊羣遭攻擊逃竄。



圖14



圖15

圖15：老虎嘴溝一道梁，編號39組，畫面寬30厘米，高33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部為一隻垂頭羊圖畫，中部似動物屍體符號，下部為蛇形符號。此符號文字的意思指羊羣遭蛇毒殺，一死一傷。

圖16：大麥地一道梁，編號101組，畫面寬9厘米，高22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左部為一羊形圖畫，右側為一豎欄欄符號，意指圈養。



圖16

三、早期抽象的符號文字比繪畫文字更難識讀。

符號即表示抽象化了的物質，即實物符號。它是人們交際過程中的有意義的媒介物。卡西勒認為：哪裏存在着符號形式，哪裏就存在着表象世界。表象符號，“是由簡單的符號發展成的另一種複雜符號體系，是由線條、色彩、體塊等直接結合（或是以複雜的方式結合）成的視覺形式……”（滕守堯《審美心理描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11月版，P.213）。

文字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最偉大的符號系統。開始以繪畫形式作為交流符號，繼之以部分抽象符號和繪畫，最後完成用抽象符號作文字。

在大麥地岩畫中刻劃符號相當豐富，甚至多到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步。這樣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大麥地文化底蘊的深厚。這些符號同陶器刻劃符號相近但有所區別，筆劃圓鈍。

舉例如下：

圖17：新井溝東一道梁，編號128組，畫面寬18厘米，高17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主要由六個放射狀圖畫組成，近似太陽光芒，其下似雲朵。其意似烏雲遮不住太陽。

圖18：西坡，編號65組，畫面寬28厘米，高18厘米，鑿刻製作。此圖由Y形、丁字形和粗細不一的條形組成，排列有序，分上下2排，似人獸行進踪跡。



圖17



圖18

圖19：西坡，編號102組，畫面寬18厘米，高8厘米，鑿刻製作。此圖由兩個似眼睛又似直立狀的蛇行圖畫組成，其右側有表示區域的界劃，示蛇區警示。

圖20：西坡，編號59組，畫面寬13厘米，高14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左側、中間由兩個凸字形組成，又似兩個直立狀的婦女，右側是一個相對的凸字形。可能是性符號。



圖19



圖20

圖21：大麥地一道梁，編號30組，畫面寬6厘米，高4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左側為卧U字形表示區域，右側是一個動物符號，下部為一個驅趕物符號。其意似驅趕某一大型動物到某一區域去，似狩獵。

圖22：西坡，編號99組，畫面寬5厘米，高6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部為凸形符號，其下為一橫，再下似羊形動物，底部為一羊形符號。此圖上下由四個符號組成，似一個字又似一個語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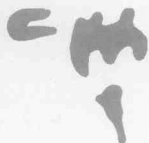


圖 21



圖 22

圖 23：石房南一道梁，編號 263 組，畫面寬 8 厘米，高 17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右上方為石刀形，左上方似滴血羊首，左下為無首羊形符號。表示宰殺牲口。

圖 24：大麥地五道梁，編號 48 組，畫面寬 6 厘米，高 15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左上似人站立行，中部似蛇吐信形，右側似脚印。意為出行遇蛇，不祥。



圖 23



圖 24

圖 25：苦井溝，編號 121 組，畫面寬 19 厘米，高 34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左為豎凸形性符號，右為羊形。表動物求偶。

圖 26：新井溝東一道梁，編號 123 組，畫面寬 14 厘米，高 15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左上為圓點形，右上為豎凸形，其下為倒丫形。似與性有關。



圖 25



圖 26

圖 27：石房南一道梁，編號 324 組，畫面寬 9 厘米，高 11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左上為丫形，其下為輪匙形，右上部為帶鉤一橫，其下為二橫和一個橢圓形，底部為一長橫。場景散亂，其意複雜。

圖 28：大麥地七道梁，編號 111 組，畫面寬 15 厘米，高 15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由上下兩個半鉤形組成，其意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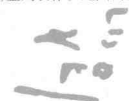


圖 27



圖 28

圖 29：石房南一道梁，編號 394 組，畫面寬 20 厘米，高 13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部為短十字似武器形，下部為簡化羊形，有頭、有身、有尾，無四肢呈臥狀。其意為羊遭擊殺。

圖 30：石房南二道梁，編號 87 組，畫面寬 10 厘米，高 6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部似變形豈芽符號，中部為一橫，下部為八字形。其意不明。

圖 31：金水子，編號 11 組，畫面寬 8 厘米，高 39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由上下兩隻無四肢羊形符號組成，彎彎的羊角指明是羊角符號。可能與統計遭獵殺的羊的數字有關。



圖 29



圖 30



圖 31

圖 32：西坡，編號 128 組，畫面寬 7 厘米，高 9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部表示天下暴雨，下部為河流暴溢成災。

圖 33：新井溝，編號 13 組，畫面寬 11 厘米，高 15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左上為蝌蚪形，右側為動物形，其下為丫形，底部為動物形。表示動物散亂獸足印。



圖 32



圖 33

圖 34：大麥地七道梁，編號 109 組，畫面寬 10 厘米，高 10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右上部似蘑菇形石柱，左下部似動物。其意追殺動物。

圖 35：西坡，編號 132 組，畫面寬 13 厘米，高 9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部為橫勾形蛇符號，下部丫形符號似表示岔道。意為岔道口有蛇。



圖 34



圖 35

圖 36：大麥地八道梁，編號 23 組，畫面寬 4 厘米，高 11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左側類人而表示人，中部一豎似石柱，右側似長鼻象形。其意驅趕大象。

圖 37：大麥地五道梁，編號 117 組，畫面寬 23 厘米，高 27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左側為丫角形，其下為十字形，中部為一橫，右側為八字蹄印形。場面散亂。



圖 36



圖 37

圖 38：老虎嘴溝，編號 46 組，畫面寬 13 厘米，高 9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部為橫丁字形，下部為橫日字形。其意不明。

圖 39：新井溝頭道梁，編號 35 組，畫面寬 9 厘米，高 28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下為一橫，中間為橫 H 形。可能表示數字。

圖 40：大麥地六道梁，編號 71 組，畫面寬 13 厘米，高 21 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左側似蛇形，右側表示區域或蛇穴。其意表示附近有蛇。



圖 38



圖 39



圖 40

圖41：金水溝黑山頭，編號52組，畫面寬22厘米，高19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部和下部似兩人舞蹈。

圖42：新井溝東頭道梁，編號95組，畫面寬16厘米，高18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左側似羊首形，右側上部為點形，下部Y形似肢體。可能是宰殺羊隻場景。



圖41



圖42

圖43：老虎嘴溝一道樑，編號19組，畫面寬13厘米，高13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部為彎U頂，下部為凸形。其意不明。

圖44：苦井溝，編號3組，畫面寬11厘米，高13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上部似人四肢伸展作呼喚狀，下部似人朝天仰臥。意為呼喚亡靈。



圖43



圖44

圖45：石房南一道梁，編號75組，畫面寬16厘米，高13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左上部為芽形，似蛇；其下部鈎形，似人或動物遭蛇攻擊狀，右側上下部為蹄印，方向相反，表慌亂奔跑狀。

圖46：新井溝西黑石梁，編號79組，畫面寬9厘米，高9厘米，鑿刻製作。此圖左側為扁圓形，表區域。右側為百字羊形，其下似駝形。其意指動物自然遷徙覓食。



圖45



圖46

圖47：石房南二道梁，編號151組，畫面寬45厘米，高24厘米，鑿刻製作。此圖似人面，又似圓欄內上部有兩個方向相反的蹄印，下部為十字形。意指圈養動物。



圖47

我們不難從上述的對比和研究中發現，大麥地岩畫圖畫也好，符號也好，大體是方圓形的，筆劃鈍圓，與世界上其他古文字之間區別懸殊，不存在傳承關係。

我國著名古文字學家唐蘭先生早在1934年就提出了漢字“三書說”，即象形、象意和形聲，高度概括了漢字造字的要義。同時他認為，原始字只有圖畫，由表示各實物的圖形，用種種技巧來表現更繁複的意義，才逐漸有“象意”字的出現。中國的圖

畫文字至少已有10000年以上的歷史，象形象意文字的完備，至遲也在8000—6000年以前，形聲字的發創，至遲在5000年前……漢字大概是在原始社會晚期出現的象形符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漢字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之前，曾經歷過一個既使用表意字、假借字、形聲字，又夾用圖畫形式表意手法的原始文字階段。漢字基本上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大致在夏商之際。唐蘭把原始文字演化成近代文字的過程分為三個時期：由繪畫到象形文字的完成是原始期，由象意文字的興起到完成是上古期，由形聲文字興起到完成是近古期。他認為，現有的古文字材料幾乎全是近古期的，但是近古期裏的較早部分（指殷商商的全部和西周周的早期）離上古期不遠，還能夠看出古文字的大概。在近古期裏，時代越早象形象意文字越多，形聲字絕少，時代一遲，就成為反比例。隨著時間推移，產生大量形聲字。根據這一部分材料，可以考見許多文字原義。^①

漢字在發生、發展過程中，形成一個獨立的有自身規律的文字系統。最後由甲骨文發展為篆文、隸書、行書、楷書，到今天仍為中華民族和世界人民語言交流的工具。

大麥地岩畫是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使我們看到了古老文字產生發展過程，這實在是歷史的厚愛和饋贈。在大麥地岩畫中符號文字不在少數，單個或成組的，約占大麥地岩畫的十分之一。因此可以說大麥地岩畫是一個文化的和原始文字的寶庫，在這裏可以找到古老文字的源頭。

關於漢字的起源一般傳說是黃帝的史官倉頡創造的，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倉頡之初，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其實文字是大眾創造的，倉頡只能說做了許多總結、歸納、規範的工作。唐代的張彥遠是較早探討繪畫與文字源流的史家，在《歷代名畫記》中提出“書畫異名而同體”，也就是繪畫與文字是同源的，他認為在倉頡造字之時，“與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靈，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又說：“顏有四目，仰觀象象，因龜鳥龜之迹，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聖哲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筆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並引顏光祿語：“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張彥遠結論是：“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

大約到了戰國時，古人稱勾描器物、形狀的即謂之畫，如《廣雅》：“畫，類也。”《爾雅》：“畫，形也。”而稱文字的，則有“倉頡造大篆”（《呂氏春秋》），“倉頡仿象”（《孝經援神契》），“（倉頡）仰觀象星圖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迹之象，博採衆美，合而為字”（張懷瓘《斷書》），“高辛氏以人紀事，貫仙人之書，車器衣服皆為之。”（《墨客》）^②

這些文字淵源之說雖然僅僅是隻鱗片甲沒有形成理論和系統，但仍然十分寶貴，說明文字的研究歷來被人們所關注。只是苦於沒有更多的資料而停滯不前。

漢字西來說盛行已久，英國思想家培根（1214—1292）就認為漢字是拉丁文衍生而來的。此後的幾百年間西方傳教士從不曾中斷過對漢字的研究。1625年發現的一塊聶斯托里教（即景教）石碑，其上刻有敘利亞與漢字的混合體。這一發現被稱為漢字是由中東傳入的證據。由此推斷商代的甲骨文也是在中國以外的地方起源，後來擴散到中國。從此中國文字西來說長時期統治着學術界。直到1989年，漢字起源的絕對年代在國際學術界仍被認為至少晚於幾種已發現的古文字，即南美洲不達米亞複雜刻劃（3350B.C.），蘇美尼亞楔形文字（3200B.C.），埃及象形文字（3050B.C.）。所以漢字的起源是一個國際

學術界爭議的問題。^③

在2003年1月英國布朗叢書公司編著的《古代文明》一書中說，從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間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生活着蘇美爾人，他們創造了最偉大的人類早期文明，他們在書寫和數字方面都是先驅者。

從公元前8000年起，蘇美爾人就用陶器標誌來標識貨物，並沿襲到公元前4000年。這些符號就是最早的書寫符號。公元前3500年左右，蘇美爾人在兩河流域肥沃的土地上耕種，他們把剩餘的糧食準確記錄並儲存在寺廟的倉庫裏。後來隨着城市規模的擴大，商業的發展與往來，自然產生了對文字的需要，他們用小木棍在泥製的板子上刻劃出了許多由粗到細的線條，很像木頭砍成的楔字，於是就成了被認為是人類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其實這種楔形文字的前身仍然是象形文字，即圖畫形式，如牛字，就畫成一個形象的牛，後來慢慢地簡化了，就變成了抽象的牛形符號。動詞“說”可以用嘴的象形文字表示，這是會意。蘇美爾人的“生命”和“箭”發音相同，生命一詞就用箭的象形文字來表示，這是同音假借。後來這種文字體系還包含了表示語言聲音的符號（輔音和元音）。^④

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是鐫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在烏魯克城被發現。泥板製作於公元前3300年，是記賬的清單。另一塊楔形文字泥板製作於公元前2500年，寫的是買賣田地和住房的契約（圖48）。^⑤

埃及堪稱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其文字產生於公元前3100年，雖然埃及文字受到蘇美爾文字的影響，但埃及人仍然創造了自己的象形文字和符號文字。它的特點是象形文字和表形符號代表字相結合的文字體系（圖49），^⑥埃及的象形文字後來又演化成兩種手寫體，即象形文字和通俗文字。通俗文字的使用更方便快捷，用來管理和記錄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農產、土地測量、法庭案件和皇室法令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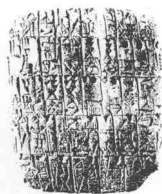


圖 48

1799年法國人入侵埃及的第二年，在亞歷山大城附近的羅塞塔發現了一塊玄武岩石碑，其上鐫刻了三種文字，有埃及象形文字、埃及通俗文字和希臘文，記錄的是公元前196年為慶祝托勒密五世加冕一週年製作的。自1802年以來，羅塞塔石碑一直在倫敦大英博物館中展出。法國學者商博良依據希臘文與埃及文字的對應關係，解開了埃及象形文字之謎。

埃及人有許多不同的書寫形式。最常見的是一種僧侶書寫法，用蘆杆筆寫在紙莎草紙上和陶器碎片上，多為簡單的單個文字符號。另一種是刻寫的形式，是刻寫在神廟、陵墓上的象形文字；被稱為“神的言詞”，大致是描畫現實世界中的事件、人、動物、傢具等，這些圖畫或是表音或是表意，構成一個詞語



圖 49

和句子，是人類最古老的文字之一。^⑦

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印度，文字發明也相當早。

公元前6500或更早的年代，印度河流域已經開始了原始農業和原始寶石加工。公元前5000年人們製作陶器，發展成了高超的製陶業，珠寶業的生產也更加完善，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公元前2600年左右的哈拉帕文明時期，隨着城市的發展、農業的興旺、宮殿廟宇的建設以及貿易的發達，文字也就應運而生了。

古代印度社會的人們刻製了不少石頭印章，現發現有2000多個，上面刻有動物圖形，如牛、大象、犀牛、獨角獸等，同時也刻製了一行印度古老的象形文字。印章上的文字多是反的，如同我們的木刻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字一樣，印上以後就成正的了。這些文字可能是持有人的名字或是頭銜和職務等（圖50）。^⑧



圖 50

我們現在能見到的印度最古老的文字就是這些石頭印章上保留的古印度文字。後來這種文字也消亡了。^⑨

我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國之一。而中國文字在《古代文明》一書中是這樣解釋的：“沒有人知道中國古代文字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最早保存下來的記錄是商代（1766 B.C.—1100 B.C.）。"^⑩其實甲骨文時代，語言文字已相當發達，現代漢語言文字和它一脈相承。

甲骨文是殷商時期在占卜時刻在龜甲或獸骨上的文字，又叫甲骨卜辭（圖51）。^⑪1899年被發現，目前收集有約16萬塊，甲骨文有4500個單字，現在釋讀的不足2000字。甲骨文記事簡單扼要，少則數字，多則百餘字，內容豐富，是當時社會的真實記錄。



圖 51

中國文字的產生、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甲骨文是中國最早最成熟的文字，但甲骨文的產生與發展不是憑空而來的，也有一個繼承發展的過程。

《尚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古書之一，在《尚書·多士》中就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記載。書中說的“有册有典”，就是說早在商朝之前就利用文字書寫的“册”、“典”記載歷史了。

事實上，夏代已經有了文字。

在河南登封縣王城崗遺址出土的一件龍山文化晚期的陶片上，就刻有一個字，像是雙手捧着一個東西。這個字與商周甲骨文中的“共”字相仿，發掘者認為是個會意字“共”字。

在山東鄒平縣丁公遺址發現的一塊龍山文化晚期的陶片上，刻有 11 個字（圖 52），經考古專家和古文字專家認定，寫的是“招祖保福，驅邪求吉”，依據陶片，丁公陶文距今約 4100—4200 年。

後來，考古工作者，在江蘇高郵市龍虬莊附近的河道采集到一塊陶片，上面刻有 2 豎行文字，右行字體大，似魚、獸形象，左側字體小，與甲骨文相似（圖 53）。雖然陶片沒有比照的地層關係，但陶片是客觀存在，而且這塊陶片又與山東、河南地區龍山文化遺物相似，因此，也可以推定這塊陶片屬於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晚期遺物。僅從上出土的龍山晚期陶片上就可以看到，至少在夏或夏以前，在黃河流域就已經有了規範的文字。^[32]



圖 52



圖 53

從 20 世紀 30 年代起，在中國大地上出土的陶器、石刻等文物及近期發現的岩畫都有力地說明，漢文字的產生是中華文明的見証，也從中看到漢字演變的軌迹。如 20 世紀 30 年代以後，在我國青海、甘肅、河北、山東等廣大地區發現從仰韶文化到商代文化的遺址 30 多處，出土陶器符號 680 多個。考古絕對年代在公元前 6000 至公元前 3800 的陶文共約 164 個，現概述如下：

1、寧夏地處黃河上游，黃河從中衛黑山峽進入寧夏以後大致由西向北橫穿寧夏的北部地區，黃河流域中華原始先民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悠久歷史，也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

地處黃河中游的河南省滎陽縣仰韶村在 1921 年發現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而得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區域主要分佈在陝西關中，河南大部，山西南部，河北大部，及與甘肅交接的黃河河套寧夏、內蒙地區，甚至湖北西北部也有發現，總計已逾千處。

仰韶文化其範圍之廣也可以稱為諸華夏文化之冠。仰韶文化年代在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經歷了 2000 多年的發展歷程。

仰韶文化時期，人們已經開始了定居，形成了較大的聚居點，村落面積也相當可觀，有數萬到數十萬平方米，有的聚居點有防護壕溝。房屋多是半地穴式的，有圓形的，也有方形的。在壕溝一邊為氏族墓地。

寧夏賀蘭暖泉農場的細石器文化遺址同仰韶文化遺址相近。^[33]

仰韶文化時期已經出現原始農業，種植粟、黍等作物。已經掌握了手工製陶工藝，掌握了慢輪修整，在陶器上飾以彩繪。

常見的器形有碗、盆、罐、鉢、小口尖底瓶等。彩繪的文飾以黑色或紅色為主線。其中半坡出土的陶器飾紋以三角紋為多，還有生動的人面、魚、鳥、蛙、蟲等動物圖案。

仰韶文化更精彩的是在陶器上發現了許多刻畫或描繪的符號。據統計在半坡出土的一些陶鉢口部和少數陶盆外壁及鉢底，發現有刻符共 110 多件。半數為一豎道，也有兩豎道並列的，一豎道上下帶鈎的，豎道一側帶二、三橫道的 20 多種。姜寨發現更多，約 130 多件，有的與半坡相似，有的更為複雜（圖 54）。^[34]看來這類刻符當是與製陶有關的記事符號，也有人認為是原始文字，是一種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35]



仰韶文化陶器符號

1—25. 西安半坡；26—48. 臨潼姜寨；49—51. 寶雞北首嶺；52. 長安五樓；53. 邵陽野；54. 銅川李家溝；55. 臨潼壩頭；56—59. 秦安大地灣

圖 54

2、黃河上游的馬家窑文化，屬新石器晚期文化，生產以農業為主，使用石器與骨器。陶器常繪有黑色的花紋，圖案與仰韶文化的紋飾不同。被稱為“甘肅仰韶文化”。與寧夏原始文化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馬家窑文化因首次發現於甘肅臨洮縣馬家窑而得名，據碳十四測定，為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自身延續約 1 千多年。

馬家窑文化製陶業已經相當發達，泥質陶呈橙黃色，較細緻光滑。彩繪以黑色為主，個別的在黑彩中間繪白彩。紋飾以平行條紋、垂輪紋、弧線三角紋、螺旋紋、圓圈紋、圓點紋、方格紋組成變化多端的圖案，顯得清新流暢，富有裝飾性的風格。此外，還有圖案化的蛙、魚、鳥、鹿、羊等形象，還出土有 5 人連手舞的優美寫實性藝術品。

在馬家窑文化的陶器上同樣發現了不少刻畫的符號（圖 55）。^[36]大致與仰韶差不多，但總量要多，而且變化也多，趨於更複雜的發展方向。^[37]



馬家窑文化陶器符號

1—10. 甘肅半山，馬廠；11—88. 青海樂都柳灣，

圖 55

3、大汶口文化是以山東省泰安縣大汶口鎮與寧陽縣堡頭村的文化遺址得名的，此處遺址位於注入黃河的大汶河邊不遠處。

1959 年開始發掘，1974 年又進行了第二次發掘。大汶口文化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以糧粟為主。生產工具仍是石器，

聚落點亦是半地穴式的。

大汶口陶器生產的發展，早期以手製陶為主，多為紅陶。中晚期黑灰陶增多，薄胎黑陶工藝高超，為後來的龍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杯的問世打下了基礎。同時，出現了白陶。薄胎、質硬、色澤亮麗更是難得珍品。製陶業有了慢輪生產並且形成了一定規模。

大汶口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400年。^⑩

大汶口文化在仰韶文化的平臺上又有了新的進展，尤其在山東莒縣陵陽河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發現的象形符號已經具備了漢字的雛形。（圖56）從大汶口出土的陶片上看到漢字初期的原樣，它們基本保留着圖畫的特性，即圖畫記事和以象表意。



圖 56

左側第1個符號像斤形（一種斧子），第2個符號像鉞形（古代兵器），也像斤形。可能都是斧子。第3個符號下面是“山”形，可能是“旦”或“靈”字，也可能是“靈”與“山”合文，也可釋為“靈山”。第4個和第5個符號上面像日，下面像火焰或雲氣，有人釋作“昊”（火光），或者是“昊”，也有人釋“旦”（早晨），也有人說它們是大汶口文化中所崇拜、所祭祀的太陽神的徵像。^⑪

大汶口文化古文字具備了圖形與會意的結合。可能是漢文字的源頭之一。而大麥地岩畫符號文字與山東莒縣陵陽河遺址出土的陶器文字恰好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用龍石黃衣計算大麥地岩畫早期文字符號至少在公元前11240年至公元前8864年，因此，大麥地岩畫的圖畫符號同陶文符號一樣可能是漢字的源頭活水。

大麥地岩畫區內圖畫符號可以歸於原始文字，其主要依據是：其一它不是隨意刻製或敲擊的，如同其他衆多岩畫一樣是有感而發、有為而作，已經由作者賦予了深刻表意的內涵。其二這些象形符號具有了中國原始文字的基本象形形態，在大致同時期的陶文符號和後來的甲骨文可以找到相近的形象。其三由兩個以上的象形符號組成的，已不是單純的符號了，基本上具備了象形字、會意字、指事字等構成文字的要素。至為關鍵的是這種象形符號在大麥地岩畫中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星狀分佈的或成組的複合的，或者說是排列有序的。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即大麥地岩畫中，有許多象形與抽象符號已經具備了古老文字的要害。

我國近代國學大師梁啟超對古文字有一定的研究，他提出一些十分精闢和高明的見解。梁啟超在《小學音韻學》中說：“最初的字總是從實物或實象造起，漸漸到人類的動作，漸漸到人類心理，漸漸到純抽象的名詞。文字發展的次第大概如此。動作心理等已經有大部分來不及造，用舊字假借。還有所謂詞語的部分發音（發語詞、感嘆詞、停頓詞、疑問詞等等），最初純用口語或手勢表現……”^⑫以此作為結語再恰當不過了。

漢字與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聖書文字、印度的象形文字並稱為世界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它們都對人類文明和進步作出過積極的貢獻。但是其中只有我們中華民族的漢字仍然沿襲了古老的造字方法，屬表意文字。由於漢文字的特點，漢字仍舊表現出無限的生命力。

大麥地岩畫的文化積澱深厚，是一座開掘不盡的寶藏，等待着我們去認識、去發掘。

- ① 唐蘭《古文字學專論》（增訂本），齊魯書社1981年版，P.75—80，P.83—93。
- ② 高銘路《“倉頡造書”與“書畫同源”》，《新美術》（滬）1985.3，P.40—42。
- ③ 唐建《賈湖遺址新石器時代甲骨契刻符號的重大考古理論意義》，《新華文摘》1992.8，P.66—68。
- ④ 《古代文明》[英]布朗叢書公司編著，山東畫報社2003年1月版，P.94，P.306。
- ⑤ 同④P.306。
- ⑥ 同④P.242。
- ⑦ 顧晉海《甲骨文發現與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11月版，P.61。
- ⑧ 同④P.152。
- ⑨ 同④P.152。
- ⑩ 同④P.358。
- ⑪ 詹子慶、田澤濱《中國古代史》上冊，P.111。
- ⑫ 杜金鵬、焦天龍《文明起源史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1月版，P.112。
- ⑬ 鍾侃《寧夏古代文物》，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14。
- ⑭ 王益賢《史前陶器符號的發現與漢字起源的探索》，《華夏考古》1994年3月。
- ⑮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版，P.61—62。
- ⑯ 同⑬P.8。
- ⑰ 同⑮P.106—109。
- ⑱ 同⑮P.86—95。
- ⑲ 郭錫良《古老而有趣的漢字》，《新華文摘》1991年4期，P.168。
- ⑳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P.206。

Rock Art and the Early Civilizations of China

by Emmanuel Anati

Executive Director, CCSP, Centro Camuno di Studi Preistorici, Italy

The fine arts of China are very much admired in Europe. The art objects of Dynastic societies have been collected and appreciated in museums and are considered in every major book of art history. The rock art of China is less known.

The rock art, that is the art engraved or painted on rock surfaces, is the testimony of tribes and minorities of Dynastic times and of Pre-dynastic societies especially since Neolithic times. They are the expressions of non-literate populations, recording and communicating their messages. They are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both, the early civilizations of China and the various aspects of popular art and popular beliefs in Dynastic times. This patrimony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little known in Europe.

The CCSP - Centro Camuno di Studi Preistorici - is the Italian research center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prehistoric and tribal art. Since 1991 the CCSP has organized study trips to China concerning the origins of Chinese art and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 The main goal is that of develop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history and stimulate a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archaeologists. Italian colleagues are most enthusiastic of this experience. Some of the main specialists in Chinese rock art have spent periods of training and research at this Center and have been my students. I maintain a warm and friendly memory of the stimulating discussions at this Center with Prof. Chen Zhao-Fu, Dr. Tang Hui-Sheng, and others.

The study trips gave us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with Chinese university professors, artists, administrators and other people of culture, acquiring a direct knowledge which we transmitted to our students and to our readers. The friendly communication developed a positive cooperation and contributed to make better known in Europe the important Chinese patrimony of rock art.

Our interest focused primarily o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but we visited other regions as well. We explored several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mainly the Provinces of Xinjiang, Gansu and Qinghai. We admired the Zuo Jiang Valley in the Guangxi Province and other major areas of rock art. However, we concentrated our interest on the Autonomous Province of Ningxia and in particular on the Helan Shan range, a remarkable area for the wealth of rock art and of other early archaeological remains. For several years our main guide was a good organizer and good friend, the travel operator An Ya-Ping of Yinchuan. Li Xiang-Shi and othe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from Ningxia accompanied us to visit the remarkable site of Da-Mai-Di where rock art of hunters and of

pastoral groups are found in a beautiful landscape.

We visited also many archaeological sites. The Huang He (Yellow River) crosses areas with the most intensive and developed agriculture in the provinces of Shandong, Henan, Shaanxi and Shanxi, where prehistoric villages developed as early as the 7th millennium BC. along with very early irrigation systems.

Through the studies of Neolithic villages like the Banpo site, near Xi' an, we acquired knowledge on how irrigation canals allowed to expand the agricultural land and, at the same time, allowed to control the distribution of water which is the major wealth for agricultural populations. The early control of water resources is likely to have been the source of development of a class which organized irrigation, collected taxes and which, in its turn, was the base for the birth of empires and dynasties. Since then, the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the planning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irrigation became, for millennia, the main source of political power and of wealth.

In other areas which are today widely populated by minorities, along with Han people,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becomes narrower being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and dunes, and the wide use of agricultural land developed more slowly. In many areas the agricultural land is primarily concentrated in places where irrigation could reach easily,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As soon as one gets out of the valley, the landscape is shallow steppe and desert, or stone mountains where pastoral areas replace agriculture. This is primarily evident in Inner Mongolia and Qinghai. The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crossing Ningxia and Gansu sees an alternation between the two landscapes, but the agricultural areas are still more limited than in the lower provinces. In both these two provinces, in Ningxia and Gansu, for hundreds of miles, the Great Chinese Wall follows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meaning that also in historical times, for long periods, this was the border between sedentary population on one side and nomadic groups on the other.

An immense concentration of rock art, counting over 350 engraved rock surfaces in the Helan Shan mountains, constitutes an archive on stone, recording several millennia of events, representing at least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population: 1) Early Agriculturists, which developed in the area since at least the 7th millennium BC., but probably already in the 8th millennium BC.; 2) Pastoral tribes, coming primarily from Mongolia, have been present in different waves, throughout at least six millennia, from the 5th millennium BC to recent times; 3) Hunting and Gathering Populations, produced rock engravings for at least ten thousand years. Starting before the other two kinds of rock art, they persisted with the other two. For several millennia different types of societies coexisted in the same areas, with groups of hunters, the agricultural villages, and semi-nomadic pastoral populations.

The rock art, usually rock engravings, as rock paintings are quite rare in Ningxia, represent different styles and ways of life. According to parallels to rock art in other regions of Asia, various groups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left their records on the rocks. The earliest are hunting groups, then some pastoralists and animal raisers were pres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But the bulk of the rock art is that of societies practicing a mixed economy including agriculture, animal husbandry and hunting.

While the rock art of Helan-Shan is concentrated in a major valley, that of Da-Mai-Di is in a

hilly area on the mountains. Like Helan-Shan, also this area has remained until recent times a place of temples and pilgrimage. The tradition is likely to go back to prehistoric times.

In the area of Da-Mai-Di several hundred engraved rocks present a wonderful open-air museum. A site where lovers of art are most gratified. Most of the art represents hunting and pastoral activities, while agricultural societies are little represented. This area appears to be ground for hunting and animal raising, and a place of gathering for tribal groups.

In Helan-Shan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ntration of rock art concerns images and masks of gods and spirits. The Helan-Shan valley have the richest concentration of this kind of rock art of masks. Some similar masks are represented also at Da-Mai-Di. This pattern persisted for a long time, starting in the Neolithic period. Several of these masks in Helan-Shan are accompanied by depictions of weapons and tools, mainly axes, that may be related to the ages of the early Dynasties, Xia, Shang and Zhou. It seems that during almost two thousand years the Helan Shan valley was a place of worship and pilgrimage focused on the cult of ancestors, spirits and other beings represented by the masks. A few figures of masks reflecting the same cult was also present but less abundantly, in Da-Mai-Di. Here hunting ceremonies appear to have been a major theme.

During the period corresponding to that of the Zhou dynasty, a new style of rock art appeared. It is characterized by depictions of stylized animals with pattern decoration on their bodies. Some may be totemic animals like the tiger and the deer. This style is widespread and well known in various parts of Asia and is related to the Scythian tribes. They were shepherds and hunters and famous horsemen that originated in Central Asia. Their tribes spread over east to China and west to Europe. These groups had a long presence in Ningxia and in later phases they were in some way affiliated or connected with Mongolian tribes. Also this style is well represented in Da-Mai-Di.

The late rock engravings of Ningxia are depicting caravans. Some of the animal figures may represent camels. They are likely to be rather recent, only a few hundred years old, the art of Islamic groups involved in trading related to the Silk Way.

The rock art sites are important source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may become a resort for both education and cultural tourism.

The rock art of the Ningxia province contains a rather unique record of different typ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hunting societies, the pastoral and animal-raising tribes and the sedentary villages of agricultural people. Hunters and pastoralists lived in the mountains. Agriculturists villagers lived in Yellow river valley and along lateral rivers. The major concentrations of rock art are located at the border between these two kinds of landscape, in localities where people met for special festivities and for worship.

The contacts and contrasts between these different kinds of populations seem to have been at the roots of many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early China. The early agriculturists met with hunters-gatherers. The contrast between sedentary agriculturists and pastoral nomads have marked the events along the northern borders of China also in historic times. The meeting of different tribal groups with th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s seem to have been a common pattern of the culture of this province since Pre-dynastic times.

The valley of the Yellow River has remains of early Neolithic cultures. The material remains of